

政治知识化与理性政治生活的成长

编者按: 政治知识化是一个思考理性政治生活建设的课题,也是知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变迁与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密不可分。新政治形态的成长需要有新知识形态为支撑,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道理建构是政治制度建构的上位问题。从古典政治学创立时起,政治知识化就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哲学王”思想的提出就是其中的重要结晶。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政治学,但一直重视寻求理性政治生活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最终浓缩为“修齐治平”思想,强调人格 and 知识训练是获得理政资格的前提。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为使政治生活摆脱宗教迷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霸权,众多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过政治与知识、政治与学术和理性政治的问题,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根、孔德、韦伯、哈贝马斯和欧克肖特等。我国清末国学大师梁启超也专门谈论过学术竞争力与中西方社会竞争力的问题。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徐复观也做过《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文集,对学术、知识与政治的界分和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研究政治知识化问题,不仅可以使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拓展政治学的新领域,比如说知识政治学;更可以增加各政治生活的主体明白政治逻辑和道理的机会,以提升全社会的政治创新力、政治规范力、政治执行力和政治参与力,使理性政治生活的成长获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共同支撑。学术界对政治知识化问题的研究尚处于理念唤醒、概念建构阶段,还缺乏深度的学理建构、践行机制和社会条件方面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执政的命题,为政治知识化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本刊这期组织编辑的这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政治知识化问题的学术基础、核心议题、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以期引起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 政治知识化; 和谐政治; 制度运转; 市民社会; 人民主权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08)01-0076-11

政治知识化: 思考政治生活的新维度

清 源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从知识的视阈思考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是政治学理论的一贯传统,用知识解释政治的范式应该成为经济解释政治的范式的重要补充。

政治知识化、科学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的科学化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发展趋势。”^[1]“知识改变命运”的警句人们可以脱口而出,“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的论断在经

济学领域已形成共识^[2],知识经济已衍生为一种新经济方式。然而,“政治知识化改变政治命运”的道理,人们却很少去体悟或体悟不深。其中的原因很多,重要一条就是人们认识政治问题的方法和维度大都还囿于传统。断章取义地解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意义,片面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一条路,故而多数后发型国家都选择经济—技术主义发展战略,不重视知识变革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意义。马克斯·韦伯曾批评说,那种从经济权力析出政治权力的办法过于夸

收稿日期: 2007-09-09

作者简介: 清源(1967-),男,江西吉水人,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张,进而混淆了“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因素。^①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断言对政治和权力的解释只有经济和财富一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可以从一个时代或文化与另一个时代或文化的对比中发现。真理是与人们隶属的时代和文化所特有的世界观有关的。”^[3]人们用知识解释政治的范式可以作为在时代及文化变迁条件下补充经济解释政治的一种范式。

在思想史上,古代西方思想家从思考政治生活伊始,就把政治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认为政治是一种知识,政治学是最高的学术形式。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思想家兼执政官索伦、伯里克利、毕大各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正义、美德、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其中,柏拉图概括的“哲学王”思想是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他洞穿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核心在于理性,“理性所具有的知识,是它统治自我其余部分的资格所在,这知识,连同因这知识而有理的统治,构成王者之学。”^[4]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政治的知识化拔高到一切学术之巅,认为政治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5]。他说,正如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的一样,各种学术和科学也可以理解为最终服从于一门居主导地位的学科,它包含广义的人类利益。而这门主导学科显然是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它“决定诸如城邦需要哪种科学,哪一种人应掌握哪门科学以及掌握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才能,诸如将帅之才、持家之能、修辞之技,都服从于政治知识。”^②在古代中国,孔、孟曾提出将掌握知识,甚至掌握不同性质的知识作为区分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准绳。这一论述虽然有价值趋向上的局限性,但其中已包涵以知识作为权力配置基础的思想^[6]。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辟用知识变迁来解释政治变迁的思路也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早在清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根源。他们认为“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③国学大师梁启超更是直言“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7]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思路,后来成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只是“五四”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权完全被经济之

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树起了“创新知识—解构传统—建构多元”的理论范式。尽管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元叙事”方式的冲击^[8]。可见,政治知识化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政治与知识关系的逻辑是政治—知识—政治理性—政治科学—科学政治。在知识社会和后革命社会的今天,政治生活告别经验的主导,走政治知识化之路,推动执政方式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型,理应成为中国科学政治生活成长的选择。

从知识的视角来思考政治是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路径,也是知识政治学学术资源的源泉。知识政治学强调,政治变迁不过是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这样的观点也许有武断之嫌,但它提升了知识的递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知识政治学的核心观点是:新政治形态需要有新知识形态为支撑,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制度的建构远不如政治道理的说明那么重要^[9]。这种认识是颇有见地的。知识能否解释政治?关键在于知识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通约性,关键在于政治能否知识化?对此,欧克肖特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他说:“一个根本不能用理性来解决的政治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一定是伪造的”^[10]。理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完整的知识政治学方法应该用知识解释政治和将政治本体建构成知识的统一。但是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一致关系并非没有曲折,没有障碍。其中最容易引致政治非理性的因素就是政治系统内外的权力斗争。马克斯·舍勒把它称为知识社会学最困惑的领域^[11]。确保知识发展与政治发展趋向一致的关键在于建立对权威的理性约束机制。政治知识化的目的不是消解政治的权威,独树一帜的权威,而是将政治权威纳入知识所建构的理性逻辑的轨道,使政治生活中权威的运作按照政治科学内在规律和可以预见结果的方向演绎。

沿着知识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可以发现西方

① 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页。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转引自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8页。

③ 贯公《振兴女学说》,载《开智录》1901年3月5日。

古典政治文明是政治知识化的典范。它把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政治道理的说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用知识解释政治和政治本体的知识化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政治与知识的关系也很紧密,不过不是政治知识化,而是知识政治化,政治神秘化。中国传统政治树立了知识权力化的思想——“学而优则仕”;建构了知识权力化的制度——科举制。在那里,知识相对于政治而言,只具有工具意义和解释的功能。其创新政治、批判政治和规范政治的功能大受限制。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始终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中国近现代政治的成长是伴随着新知识的引入而生的。中国近代政治主要以西学为知识基础,但对生长于本土的中学知识却采取了不理性的态度。中国现代政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本土知识的结合为支撑,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包容性不够。因而,中国近现代政治建设的知识基础都存在一定意义的缺损。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对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出现误区,以及政治本体的知识化程度相对肤浅,政治生活时而理想化,时而神秘化、经验化和泛化的一大引因。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即明确提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补课浪潮,政治知识化也获得了难得的机遇。

党的十六大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等一系列涉及政治发展的重大命题,翻开了中国政治知识化和政治建设的新篇章。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执政是与政治知识化密切相关的命题。能力以知识为基础,是知识的深化和运用的具体体现。科学以探索规律为己任,是知识的演绎。实现科学执政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生活规律有清晰的认识,这就要求执政者和参政者掌握科学的政治知识,通过理性执政与理性参政的良性互动来实现。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97.
- [2] 刘易斯 阿. 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04.
- [3] 奇尔科特 罗.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92.
- [4] 麦克里兰 约. 西方政治思想史[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38.
- [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48.
- [6] 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M] / 费孝通文集: 第5卷.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476.
- [7] 梁启超.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C] / 梁启超文集.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 215.
- [8] 塞德曼 史.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89.
- [9] 刘建军. 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37.
- [10] 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
- [11] 舍勒 马. 知识社会学问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00.

在制度运转中推进政治知识化

曹沛霖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政治知识化是维系政治理性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要避免政治知识化流于空议, 就必须使之制度化。因为规范的政治知识的源头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思维, 也不源于无序的政治实践。制度化的政治过程是产生和创新政治知识的最可靠的来源, 也是政治知识不断理性化的保障。

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知识化, 政治知识化又离不开政治社会化, 而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治制度

化的过程又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制度治理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革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要有制度, 二是还要让制度运转起来。制度与制度运转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政治过程。没有制度就谈不上

收稿日期: 2007-09-26

作者简介: 曹沛霖(1933-), 江苏泰兴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国际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